

薛川东 著

WOYEZUOWEN

我也作文

WOYEZUOWEN

我也作文

薛川东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我也作文

WO YE ZUOWEN

薛川东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北京市朝阳燕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6开本 15印张 280千字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03183-6

G·995 定价:28.00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62050948 58572393

自序

我在小学和中学学习期间，都遇上过非常好的语文老师。所谓“非常好”，一是他们有学问，善于表达，课讲得生动、有趣味；二是他们都反反复复地强调“学好语文一定得多读多写”，并且尽量给同学们创造多读多写的条件；还有一条，那就是这些老师自己爱读书，爱动笔。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教语文的是贾老师；他在东北读过大学，喜爱文学。贾老师经常向我们介绍新出版的小说，例如，马烽的《周支队大闹平川》、徐光耀的《平原烈火》、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等等。听他讲得有声有色，我恨不得马上就能找来这些书过过瘾。有一次，他在课上讲起了赵树理，还念了《田寡妇看瓜》一文，最后，郑重地说，赵树理的作品是反映农村生活的一面镜子——尽管这话我当时听着耳生，但却记在了心里。他说自己喜爱写新诗，还鼓励我们给《中国少年报》投稿……

上初中时，李名遥先生教我语文。李先生是新乡师范学院的高才生，家学渊源，擅讲古典诗词。当时初二年级语文课本有白居易的《观刈麦》，他讲完后，意犹未尽，又给我们讲了《新制布裘》和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最后，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那是“大跃进”年代，全民都写新民歌歌颂伟大的时代，“李白斗酒诗百篇，我们一日写三千”是当时流行的豪言壮语。李先生也充满热情地指导我们写诗。我写过一首诗《跃进歌声震天庭》，其中引用“瑶池动，银河静”一类的词句，他大加赞赏，并讲了有关“诗余”、“长短句”的知识。但最让我们佩服和兴奋的是，李

先生的文章能在新创刊的《北京晚报》上发表，为此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天天轮着买晚报（3分钱一份）——教师的示范作用太大了！

陈遇春先生1952年毕业于名牌大学，她对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都很精通，气质高雅，课讲得既有深度，又非常注意启发学生思考，这对高中生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唯因如此，我才能在学习《荷塘月色》时，有“文中的荷塘，与其说是清华园的荷塘，不如说是佩弦先生心中的荷塘”这样的感悟。她经常鼓励我多读点名家作品，多写点自己感兴趣的文章。一次，我自拟题目写了一篇千字文《初春看柳》，陈先生阅后给我写的批语竟达几百字。在这则批语里，我第一次知道“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是韩愈《进学解》中名言，并初步理解了这几句话的含义。在陈先生教我的一年里，我从图书馆借书的次数最多，课下作文的篇数也最多；我在“三夏义务劳动”期间写的纪实散文《麦场上的一课》还被编入北京出版社的《中学生优秀作文选》，得到的奖品是《毛泽东选集（乙种本）》。

后来，我也当了语文教师，再回味跟贾老师、李先生、陈先生学语文的情景，更感到他们了不起，同时也认识到教师的“学问”和“教法”与教学质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做学问和改进教法，是教师的责任，语文教师必须多读多写，“腹中有诗书，笔下有文章”。这样做，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在提高自身语文素养的过程中真正把握语文学习的规律，让自己教得更得法，让学生学得更有效。

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生前多次强调，语文是一门“以实践为主体，并以实际能力的养成为依归的课”。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语文也是在学语文，教师也要“以实践为主体，并以实际能力的养成为依归”。我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努力践行。多读，我以为还不算困难，而多写却不是容易做到的。当老师的天天要写教案，时不时要写总结，但这与“多读多写”的“写”不是一回事；况且，没有人给你出“作文题”了，你没有作文的压力，稍一懈怠，便可能加入“读而不写”的行列。其实，语文教师面临的“作文题”是很多的：社会在前进，新的教学理念、教学手段频频出现，你在理解和试用中必有体会、必有疑问，这里就有“作文题”；你天天接触学生、同事，他们的言行举止会留给你很多思考，这里也有“作文题”；只要你读书，就会有感想，读书过程中生成的“作文题”太多太多……看起

来，不是无题可写，而是写不过来。语文教师要作文，首先是有责任感，其次要学会选题。这两点聚焦在一个点上，即“我为提高教学质量而作文”。

《我也作文》中的那些篇“作文”，实在没有太大的分量，只不过是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我对语文教师也应“多读多写”的理解。作文的过程也是我提高认识、增长学识和优化表达能力的过程，“多读”才可能“多写”，写时又往往迫使你再找书读，这是我最深切的体会。我的作文，同行可看，同学们也可看，因为我写的时候，就不断与他们有心灵的交流。

《我也作文》这本书共分为五篇。

第一篇“我与教学”。其中包括对教学理念的探究和备课、讲课的体会，对“文学教育”方面的问题多有涉及。第二篇“我与教材”。这里有我参加语文教材编写的“工作痕迹”；编写教材，主要是选课文、写导语、配练习，这些工作与“作文”是两码事。收在本书中的还算我的作文，有四篇是我为某套教材撰写的“知识短文”，另有两篇曾被某套教材选用作为课文。第三篇“我写师友”。这里面的文章类同学生常写的记叙文，真人真事；那些人，可亲可敬；那些事，值得宣传。

第四篇与第五篇都是阅读心得，共计四十篇，每篇只记研读某位作家某一佳作的心得，虽极想贴近“评论”，但总不到位，好在说的都是自己的体会，基本符合我们给学生提的要求——“作文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力求有创见”。为了方便学生阅读，每篇心得后面都录有原文；退一步想，这四十篇原作之于学生也是很好的“拓展阅读资料”，因为其中多数佳作未曾编入语文课本，因此便不吝篇幅，这样编排了。

《我也作文》是我向我的老师、我的同行和同学们的汇报。既是汇报，就会暴露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或许对推进实施《课程标准》有些用处。这样一本小书，不值得请专家作序，因此自己写了上面的一些心里话。感谢我的老师，培养了我写作文的习惯；感谢我的朋友和同学，给我提供了作文的材料；感谢古今名家以其佳作滋养了我；感谢北京出版社给了我向社会汇报的机会。

2008年7月

目 录

1 第一篇 我与教学

- 1 试论语文学科中文学教育的内涵与基本内容
12 把握阅读方向，提高鉴赏能力
23 文学教育的好教材
——《读白居易和辛弃疾的词四首》备课札记
27 一笔力千钧
——谈《包身工》之开篇
29 高考作文随想
34 争议有益
——学生作文引发的话题
41 “误尽苍生”为哪般

44 第二篇 我与教材

- 44 选入教材的作品
45 美虎说
46 需要一个童话的世界
——迎迓“兔年”想到的
49 为教材撰写的知识短文
49 外形是理解人物的钥匙
——谈小说中的肖像描写
51 在典型环境中刻画人物形象
——谈小说中的环境描写

- 53 | 细节大有文章
——谈小说的细节功能
- 55 | 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
——谈小说的语言特点

58 第三篇 我写师友

- 58 | 老君堂小学教工群像
- 65 | 老孙育人
——记北京 22 中特级教师孙维刚
- 72 | 老宁不老
——语文教育家宁鸿彬剪影

75 第四篇 课文随笔

- 75 | 困禁不住的生命之绿
- 78 | 三军统帅寸草心
- 82 | 定格在历史画卷中的“一面”
- 86 | 高超的“剪辑”艺术
- 91 | 心中的荷塘
- 94 | “榆钱儿”上的时代烙印
- 98 | 口语诗化似春雨
- 101 | 郭沫若诗八首评点
- 108 | 辛亥志士多悲歌
- 111 | 美哉壮哉，少年中国

118 第五篇 泛读杂记

- 118 | 催促黎明到来的柝声
- 121 | 历史的神圣与文学的尊严
- 125 | 无言而激烈的心灵搏击

128	“抓拍”时代的影子
132	“平常的故事”最真实
141	泰山是老百姓的
144	巧借譬喻，说禅阐理
147	车厢——社会的缩图
151	好山好水要文章
156	景物挟着感情流动
158	陈酿童趣
162	祭奠被抢掠的艺术珍品
168	西班牙“永恒的灵魂”
173	寻书忘岁月，人莫笑蹉跎
178	是谁撞碎了“悠恬的梦”
182	催人泪下的纺织娘行状
186	冉冉而生的乡愁
188	一帘净化心灵的冷雨
194	山长水远尽在心头
198	徽州道上无尘滓
201	以水写山，山灵水秀
204	没有厌恶，何来敬慕
207	睥睨世俗的桐城气度
210	独游之乐，独游之得
213	农民天地一等人
216	梦谒神州情未了
219	才女若璞真如玉
221	爱怜严责，舐犊情真
224	香帅是个好家长
227	纵论时势，动人魄魄

第一篇 我与教学

试论语文学科中文学教育的内涵与基本内容

一、文学教育的内涵

我们经常能听到社会各个方面对中学语文教学的批评、建议。其中，涉及文学教育的占了很大的比重。例如，有人认为“现在中学的语文课没有什么文学味儿，学生当然不爱学。”更有人建议“文学应当成为语文课的主体”。这些批评和建议都涉及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应当怎样认识和确定“文学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

语文教学有多项任务，其中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实施文学教育。但是，“语文”不等同于“文学”，文学活动不能承担语文教学的全部任务；倘真将“文学”作为语文课的“主体”，语文教育的目的是不可能全面实现的。对此，叶圣陶先生是作为语文教育的基本观念提出来的。他在《国文教育的两个基本观念》一文中概括的第二个“基本观念”便是“国文的含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他对产生“国文教育就是文学教育”这种误识的主要原因作了精当的分析——“五四运动以前，国文教材是经史子集，显然经史子集是文学。”“五四以后，通行读白话了，教材是当时产生的一些白话的小说，戏剧、小品、诗歌之类，也就是所谓的文学。”于是不少人

认为“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可阅读的呢”，因而便“偏重文学”，“都以为国文教育就是文学教育”。针对这种沿袭已久的误识，叶老据实拨谬，他说：“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括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若偏重了文学，他们看报纸、杂志与各科课本、参考书，就觉得是另外一回事，要好的只得自辟蹊径，去发现那阅读的方法，不好的就不免马虎过去，因而减少了吸收的分量。再就写作方面说，流弊更显而易见。”

廓清认识，明了文学教育在语文中的地位，是正确、有效地实施文学教育的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才可能把握住文学教育乃至整个语文教育的归宿。

叶老认为“发展个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使个人终身受用不尽，同时使社会间接蒙受有利的影响”^① 是学习语文的归宿。显然，依靠单纯文学教育是永远找不到这个归宿的。但是，在语文课中“发展个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又必须借助文学教育。文学作品是使用语言文字作为创作“质材”的艺术品，语文知识和语言文字的功能在文学作品中得以最充分的运用和展示，尽现其魅力。因此，作为语文教学的主体依据——文选式的教科书——便将文学作品放置首位（文学作品的课文在数量、质量上都居各册语文课本之首）。但在语文教育的背景下，它的一般属性应是传授语文知识的“实例”和训练语文能力的“情境”；它的特殊属性才是进行文学教育的“文本”。

言至此，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已经凸现：文学教育是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真正意义的文学教育是在语文知识的传授和语文基本能力形成的过程中逐步实施的。

因此，在非文学类课文的教学中“没有什么文学味儿”无可指摘，而在文学类课文的教学中“没有什么文学味儿”则是语文教学的缺憾；至于“文学应当成为语文课的主体”显然是有悖于语文教学性质的设想，无须再作批驳了。

当前，语文学科中的文学教育不尽如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应对文学教育的含义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为此，试作如下描述——

我们所说的文学教育，是语文教学范畴内的不可缺少的教学行为、教学过程。

在中学阶段对学生实施文学教育的目的是：激发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

^① 转引自吕叔湘《〈叶圣陶语文学论集〉序》。

培养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基本能力，促进学生道德品质、思维品质的健康发展。

实践证明，语文课中文学教育的功效，不单见诸文学方面，学生既有的语文基础知识和养成的语文学习能力在接受文学教育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再认识和再实践。对这一点，教师应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力求取得文学教育的最大功效。

文学教育赋予教师在语文教学中的基本任务是：教师应依据具有文学属性的课文（含有关的《知识短文》），向学生传授文学基础知识，讲析课文中的文学要素，指导学生掌握阅读文学作品的一般方法，安排学生的文学鉴赏活动。

学生通过不同途径建立的背景知识（如政治、历史、哲学、伦理诸方面的常识）对接受文学教育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反过来说，当学生不能自觉的调动或者缺少必要的背景知识时，文学教育的进程必然受到阻遏。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要善于引导以“激活”学生头脑中存储的背景知识或者有针对性地向学生介绍必要的背景知识，以便有的放矢顺利的推进文学教育的进程。

文学教育的各项任务既是有序的，又不是僵死的程式。在教师“传授”了某一文学知识后，学生即可能利用这一既得知识发现课文的某一鉴赏点并主动地进入审美或评价的阅读阶段。在一个教学班内，学生的这种发现往往是不同的、不平衡的。我们还会发现，有的学生在接受某一知识信息时，头脑里贮存的与之相关的文学现象即刻被“激活”。这时，该学生在课堂上的心理流向和思维活动便更具有个性化的特点。这些都会增加教学控制的难度。

出现这一现象的基本原因是：（1）文学作品和文学活动是社会大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人不可避免地要与其接触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同一班级的学生接受文学教育的起点往往是不同的。（2）学生接受社会化文学教育的自由心态具有很强的“惯性”，他们的学习目的与教师在语文课中实施文学教育的目的很难在短时间内“并轨”。（3）教师的文学素养、学生的知识储备乃至生活环境，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文学教育过程的稳定性。

因此，文学教育目的一——哪怕是其中一个子项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以数年而计的一个过程；至于文学教育的成果，也难于在学历教育阶段“灿烂辉煌”。当然，这绝不意味文学教育是苍白羸弱的；恰恰相反，只要我们态度端正并施教科学，学生在接受文学教育的过程中一定会更扎实的掌握“精要、有用”的语文知识和提高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一定会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以优化自己的道德、情操。

我们还应看到，文学教育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很难机械确定起止区间，由于受教材和学生认知能力的制约，它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伸缩性和重复性。

这里，我可以举一个留在记忆深处的例子加以说明——

40多年前，我在小学一年级下学期“国语”课上学了这样一篇课文：“农民爱土地，工人爱机器，战士爱枪又爱炮，学生要爱书和笔。”

记得老师先教生字的读音和笔顺，然后指导写生字和读课文。待我们能读顺课文后，就以“为什么”为主题问我们每句话的意思，并联系“抗美援朝”说了些道理。老师还说，这篇课文是“白话诗”对学生有教育意义，句子“押韵”，大家应该背下来。当堂我就背熟了。“白话诗”、“押韵”，这些新鲜话也记住了，当时不懂，上高小才逐渐懂了。我要说的是，在语文启蒙教育阶段，已不可避免的有了文学教育的渗透（尽管当年教我的那位语文老师把握“文学教育”的尺度并不十分准确）。后来，学李白的《静夜思》（小学五年级）老师讲古典诗和白话诗的区别，我脑子里再现过“农民爱土地……”；学王老九的《梦中想起毛主席》（初一），读到“走路想起毛主席，千斤担子不吃力；梦中想起毛主席，半夜三更太阳起……”又忆起“农民爱土地，工人爱机器……”怀疑那也是王老九写的；多少年后，我教刘禹锡《陋室铭》时，便不敢小看儿时学的第一首白话诗了，感到那明白如话的课文与“山不在高，有龙则灵……”确有些“亲缘”。可见，文学教育虽过程迢迢，但魅力深远。

还有几点，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以进一步端正对文学教育的认识——

(1) 从宏观上看，文学教育的教学过程是完整的，但在某一篇文学类课文的教学中，不可能也不必要实施文学教育的全过程，大多是在一两个环节上开展文学教育的双边活动。当文学教育的一个环节相对完成后，下一个环节的衔接既有必然性也有或然性，“程式化”的文学教育往往脱离教材实际脱离学生实际，是造成语文教学“少慢差费”一个原因。

(2) 语文课中的文学教育不能完全为学生创意性活动取代。如，讲解、欣赏了几首律诗，就让学生吟作律诗，恐怕不可取。因为这样的活动难以成为一个教学班全体成员的学习行为，况且，鉴赏与创作并不存在相依而生的必然联系。

(3) 为拓宽学生视野而举办的文学讲座，作为文学教育的辅助活动，是必要的，它所涉及的内容可以宽泛些。但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教材所蕴涵的文学因素的挖掘和讲析则应尽量与学生的知能状况、生活阅历、心理及生理特点相适应、相协调；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以教师个人的文学批评观念文学批评活动取代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活动。

二、文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课堂教学内容是由依据教学大纲编写的教材提供的。我国现行的中学语文教材为文学教育提供了主体内容，所以，对“内容”的确定，应当从教材的实际出发。首先，应依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的总体要求，挖掘、筛选、梳理教材中蕴涵的文学因素，充分考虑到其中与语文基础知识关联紧密的教育项目。这些项目在语文教学中“高频”出现，易于进入学生的实践活动。一般来说，这些项目在不同的课文中展现的内容特点与蕴涵的学习价值不尽相同，为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学教育提供了可能。

次及“合理反复”地进行某一项目的文学教育提供了材料，铺设了由个别到一般，由典型到普遍的教学路径。中学的文学教育不等同文学理论研究，故“个别”和“典型”的学习内容留给学生的印象会是十分深刻的，并具有“反刍”和“不断熟化”的价值。

文学教育的内容在不同学段、不同年级各有侧重，要求也有深浅之别。这里，仅从文学教育的整体性出发，谈谈对几项主要内容的理解。

一、有关中国文学发展和成就的教育

让学生了解中国文学发展的概况，熟悉、喜爱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崇敬为中国文学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作家，是使他们整体认识文学价值的重要教育内容。这不仅有益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养成，也有益思想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

中国文学发展概况及其成就，既包括古典的、近代的，也包括现代的和当代的。前者是文学中的历史，这“历史”本身就极具有鉴赏价值，同时，它又是欣赏现实文学艺术的“铜鉴”，实在很宝贵。后者是文学中的“现实”，它与学生的生活实际更为贴近，教育功能也就更强一些，应予以更多的关注。

中学语文课中有关文学发展概况及其成就的教育，是借助教材（主要是文学作品类的课文）进行的，它不同于工具书上“词目”式的陈述，它依托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灵魂的诗词歌赋、散文小说、剧本评论等五彩纷呈的文学样式进入学生的视野和思想，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会成为他们终生拥有的文化财富。

目前，基于教材的实际状况，这种教育基本是“散点”式进行的，有些教育因素需要教师挖掘、发现。因此，教师应善于利于中学生已有的历史编年知识，让他们将有关课文在时代坐标轴上准确定位，这不仅使学生有一种清晰的历史感，也便于从时代背景和作家境况入手体会作品的社会价值，为鉴赏创造条件。当然，教师还必须对作品从时代、样式、功能等方面作适当的说明，启发学生发现“继承、改造、创新”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语文课中“有关中国文学发展、成就的教育”，也是中学阶段各个学科对学生都要进行的“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公共思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它更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附带说一下，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成就和著名作家的介绍也是文学教育的内容。在这方面没有提供足够丰富的材料，因此“轻于言史，重于言文、言人”，通常也不失为可行的手段；在教学上可有意引导学生尝试对中、外作品作合理的比较，体会各自的特点、优势，感悟相互联系，努力发现共性。如何使外国文学作品的选编有利于现代意识的传输，是应该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2. 引导学生认识不同样式文学作品的特征，把握鉴赏方向和重点

语文教材几乎包容了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作品的各种样式，尽管它们都是以

语言文字来反映社会生活和作者思想、情感的读物，但是，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语言表达方式、素材处理手段、艺术加工特点不尽相同，个性化特征是非常鲜明的。因此，这就决定了在阅读过程中，读者除了应遵循一般的阅读法则，还必须针对阅读对象的艺术特征，采取“对位”的阅读方法，否则，“读懂”这一关就很难通过，遑论鉴赏！所谓“对位”的阅读方法，是破译作品中艺术形式及文学语言内存载的内容信息（即有关事实、思想、情感的信息）的有效手段。采取“对位”阅读，我们就有可能在“解读”过程中发现、选取鉴赏点，并进入深层阅读阶段，理解、评价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功能。中学生在学历教育阶段接触的文学作品毕竟有限，但他一生却难以脱离与文学主动或被动的交往。这样看来，在语文课授之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的方法，不但是文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优化学生的学习素质的重要举措。

教师指导学生掌握“对位”的阅读方法，应以教材为实例，逐一讲析各种文学作品的创作特点及艺术特征。这就必然涉及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定义的描述与诠释，这一步工作是应该做的。但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在阅读实践中反复认识、把握各类文学体裁的属性。这项工作不可能在一个时间点、一篇课文的教学中完成，重复是必然的，重复才可能趋于完善。

作为文学教育“示例”的课文是“认识的个体”，这些“示例”不仅具有为认识共性服务的价值，又极具独立的鉴赏价值。真正意义的文学鉴赏是要落实在“认识的个体”上的，但是它又必须在把握与之相关的“共性的认识”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进行。显然，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至关重要。有道是“观千剑而后识器”，而实际上，学生不可能“观千剑”，因而必须借助有关文学体裁知识的输入。但要审慎地把握这种“输入”的量与度，既要发挥其先导作用又要结合课文加以印证，使学生在阅读与欣赏的实践活动中理解、掌握“精要、有用”的先导性知识。

从实际需要上讲，中学生确实应当有准确区分不同体裁文学作品的知识依据，进而养成辨析同“属”文学样式中不同“种”差别的能力。这是端正阅读与鉴赏方向的前提。

例如：历史小说是允许合理虚构情节的，但对重要历史事件、主要历史人物性格特点的记述、描写则必须真实。明确了这一点，学生在学习课文《群英会蒋干中计》时就不会像清代历史学家章学诚那样，认为读《三国演义》大上其当——章氏曾惊呼：“《西游记》《金瓶梅》之类全凭虚构，皆无伤也。唯《三国演义》则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在他看来，“虚实相济”是小说创作的一大弊病。他不承认真实的生活基础是艺术虚构的本源，他眼中的《西游记》《金瓶梅》与人间烟火无干，因而也“无伤”；《三国演义》有悖史籍，当以“惑乱观者”罪论处。小说的概念在这位历史学家的头脑里是混

乱的，如果带着这种“混乱”去鉴赏小说，能有什么收益呢，有的怕只是“冤假错案”。教材编者为防止学生进入误区，在课文《群英会蒋干中计》的练习题中引用了裴松之注《三国志》的有关文字，以供教师端正学生的鉴赏方向。方向端正了，重点则好抓住，《群英会蒋干中计》中的文学人物周瑜与《三国志》中历史人物周瑜在韬略过人这一性格特点上是吻合的，这无疑是《三国演义》中成功的一笔；至于为什么把非主要历史人物蒋干“委屈”一下，也比较好解释了。

举这个例子，还想申述一个观点：隶属于语文课的文学教育必须坚持语文教学应“以知识为先导”（张志公语）的原则，文学教育的双边活动均要有既定的方向、相对确定的内容。可以肯定，语文课中的文学教育是有“矢量”因素的，如果一味强调“自为”、“随意”，势必造成教学效果的“少慢差费”，并且不利于学生良好学习品德的形成。

3. 突出文学语言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理解、鉴赏文学语言的水平

确定这项内容，是从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出发的。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传达感情、批判美丑是非的。高尔基准确揭示了语言因素在文学中的地位，他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事实证明，对文学语言的感悟能力是文学鉴赏能力的核心。

实施文学语言教育，应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使学生在学习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对文学语言基本特征的认识并借以提高鉴赏能力。在落实这一目的的教育过程中，教师应承担两个任务：第一，讲解传输必要的知识。第二，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教材组织好学生的实践活动，引导他们独立的解读、揣摩、品味课文中含义隽永或效果鲜明的语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切磋、交流。

为此，拟根据文学语言的基本特征，对相关教育目的的确定略作解说。

(1) 文学语言是生活语言再加工的艺术产品，它富有形象性，蕴涵着独特的审美价值，具有非“涵咏”不可解读的特点。

文学语言不仅能客观的描述自然、社会现象和人们的思想活动，而且能够艺术的展现“人物形象”反映作者的观念情感并深刻揭示生活的内涵。文学语言较之一般的交际语言更能激活读者“多元化”的思维功能，使其头脑中形象思维活动与理性思维活动产生碰撞、交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课文中的文学语言一旦进入学生的视觉或听觉系统，其特点就被学生自然感知，其功能就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例如：《荷塘月色》的这一句——“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如果学生对“脉脉”、“颜色”、“风致”这几个词语没有认真体味，不去捉摸它们的内在联系，那只能停留在了解句意的层次上，而不可能“激活”鉴赏所需要的思维活动。“脉脉”一词已将人的情愫赋予流水（《古诗十九首》写牛郎织女隔银河相望，有云“盈盈一水

间，脉脉不得语），“颜色”不指红黄蓝白黑而是“风韵姿态”的代称；流水有情，莲叶知情，“风致”则极具涵咏性，读者可从抽象的“词”中幻化出美好的形象。就教学过程而言，教师结合课文作“例说”，无疑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本事”传授给学生，把阅读和鉴赏的空间更多的留给学生。只有这样，学生才可能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进入艺术欣赏的自由王国。因此，教师要培养学生认识文学语言特征的能力，进而使他们养成深入挖掘文学语言的审美价值的习惯。

（2）文学语言是反映现实的“艺术化的信息符号”，它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与常态事理逻辑不尽吻合的现象。

在文学语言教育中让学生经过阅读实践，认识、理解、破译这种现象，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例如：鲁迅在《孔乙己》的结尾写道：“我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大约”，是揣测；“的确”，是判定。二者岂非矛盾？但通观全篇可以体会到，这种非逻辑语言恰切地反映了作者的感情——孔乙己何时歿世，无人知晓，人情凉薄的社会浊流淹没、吞噬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孔乙己，悄然无声自是常例；已经以手代足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孔乙己不想死也得死，残酷的现实不容任何人幻想孔乙己的再生。“大约”与“的确”，在情理上的逻辑关系是契合无隙的，非逻辑语言的涵咏价值和功效可见一斑。因此，教师应充分利用教材培养学生理解非逻辑语言合理性及其艺术魅力的能力，进而使他们养成从艺术角度审视这类语言的习惯。

（3）文学语言中词语的“临时意义”出现几率较高，这是特定内容的合理产物。

诚然，掌握积累一定数量词语的义项（即从字典、词典中可以检索到的基本意义、引申意义、比喻意义），是语文学习的一项硬任务，其意义不必陈说。但仅仅谙熟词语在“静态环境”中的义项远不能满足阅读文学作品的需要。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环境是极富有艺术性与动态性的，词语在使用时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临时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作品中词语的艺术特点和可涵咏价值，正是由所谓“临时意义”来体现的。例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有这样两句诗：“唯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烟霞”是什么意思？直白解为“烟云霞光”，则使这两句诗与前面描绘“梦游天姥”那极为瑰丽丰富的内容脱断；实际上，“烟霞”在这里有其临时意义——代指诗人李白借以自慰的梦想。试想一下，诗仙笔下既美妙又虚幻的梦想，舍“烟霞”一词似乎无语可代，妙哉！因此，教学中应培养学生结合语境揣摩、确定词语临时意义的能力，进而使他们养成关注这类词语艺术功能的习惯。

（4）文学语言的隐含信息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内涵。

文学语言中的隐含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它是人类表意行为的特定方式。它常